

市场经济 与人口控制

田雪原著
杨子慧

MARKETING AND POPULATION CONTROL

中国经济出版社

前　　言

本书为列入“八五”国家社科重点项目“生育率微观分析与人口控制机制转变研究”最终成果。按照立项要求，课题主持人协调所主持的“八五”中国社科院重点、联合国人口基金援助的CPR/90/P06项目，在进行充分的理论论证，10省市家庭经济与生育抽样调查，国际合作研究和国际会议交流基础上完成是书。本书以生育率的微观分析为重点，但这一微观分析离不开宏观大环境和社区中间环境，最为重要的是当前正在走向深入的旨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故定名为《市场经济与人口控制——从宏观到微观的人口经济分析》。全书按照这样的逻辑顺序展开：

上篇，宏观论。立足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人口变动宏观，分析在这一突破性历史变革中，在宏观上市场经济对人口控制的制约和影响。

第一章，革命性突破：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概述了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乡村、城市经济改革的进程，改革与开放相互促进发展的历史。本章首先选择中日两国近代史上国情相似，旨在发展资本主义的改革目标相似，然而中国的“戊戌变法”遭到夭折，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日本的“明治维新”取得成功，将其带入资本帝国主义的历史回顾，说明导致相反结果的最重要两条原因：一是有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支

持变法改革的、怀有强烈发展资本主义的中央集权政府。二是经过改革有没有形成具有强烈竞争的市场经济。当时的中国这两条均不具备，故改革归于失败。那么，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应当说提供了转机，照理应当迅速发展起来，“一五”也确实发展不错；可是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而经济建设也是在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体制下进行，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禁锢。1979年春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率先进行“大包干”掀起农村改革序幕，几年后城市改革也迅速铺开，城乡经济改革的基本点瞄准一个走向：市场取向。1992年党的十四大及时肯定这一点，确立经济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不仅对经济发展，而且对人口生产、人口控制说来也是一个革命性突破。本章提出，由于人口在中国基本国情中所占的突出地位，改革必须充分注意到人口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尤其是：在坚持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适应人口多、消费大的特点，需要坚持自力更生为主和对外贸易、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人口和劳动力资源十分充裕，既要充分发挥劳动力市场调节功能，也要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保证比较充分的就业。人口因素的作用和对改革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应予足够重视。它关系到许多具体改革目标的成败，也关系到改革、稳定、发展大局。

第二章，历史性转变：人口再生产回顾与展望。这是纯属人口变动分析的一章，回顾了中国人口变动的“三次大飞跃”，即西汉平帝元始二年突破5000万，清朝道光20年突破4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5年突破12亿，分析了封建社会人口与王朝更迭带有周期性变动的规律。借鉴西方人口转变理论并结合我国实际，对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的时期划分和转变过程，提出具体意见。在占有大量调查资料基础上，论述了我国目前的人口状况，从不同层面分析了当前人口再生产性质和特点。为适应人口发展战略和人口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比较70年代末至今国内外所作的许多人口预测，指出未来人口发展趋势，为以后诸分析打下了基

础。

第三章，跨世纪工程：市场经济对人口控制的制约与影响。这一章首先从宏观上概括阐述了人口控制与市场经济的一般关系，认为人口控制和计划生育本身不属于市场范畴，不能简单“推向市场”，但是应对市场经济改革对人口控制和生育率变动的影响作出充分估量，努力建立同市场经济相协调的人口控制机制。接着分析了市场经济对人口控制的积极作用：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必将大大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为人口控制创造新的物质基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终将诱使家庭由投入孩子的数量成本向质量成本转移，促使生育率下降；商品和市场经济发展，边际孩子养老效益、精神效益下降，“多子多福”生育观受到挑战；市场经济加速着人口城市化进程，有利于生育率的降低。最后，本章对在改革过程中不利于生育率下降的情况作了具体分析，主要是：孩子成本—效益的某些不利倾斜，包括乡村和城镇个体、合营一类家庭生产职能的恢复，孩子劳动——经济效益增值，养老——保险效益的反向变动，继承家业效益的复活，以及家庭人口智力投资增长缓慢，中、小学生流失严重等；某些生育行为市场化的不利影响，包括婚姻和生育买卖行为的出现，户口买卖行为，民族成份买卖行为等；还有流动人口生育管理、人口管理部门跟不上市场经济发展新情况的矛盾等。本章的分析立足于实事求是，将市场经济与人口变动现实结合起来，说明其有利、不利的影响。通过许多实际事例分析，从中悟出市场导向的巨大震撼力。

中篇，中观论。本篇由两章组成。第四章，对接的链条：中观人口控制与社区发展。首先阐述中观人口控制与社区发展理论的提出，是 90 年代初中国人口控制实践中的一个重要突破，对我国未来人口控制具有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本章围绕这一命题展开论述；概括介绍了社区理论产生和发展过程及其基本内涵，分析了社区在人口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从而从理论上奠定了社区在人口发展和人口控制中不可取代的特殊意义；结合我国人口控制

的实践经验，分析了从宏观调控到微观控制的脱节现象，从而突出了社区在人口控制中的对接作用，确立了中观人口控制的主角地位；分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社区发展的不同类型，以及针对不同情况如何发挥社区在人口控制中的调控功能和作用。

第五章，“三结合”道路：中观人口控制的创举。这一章着重分析论述了我国人口控制实践中，在政府引导下群众创造的“三结合”的基本做法和经验。首先，客观地分析了计划生育“三结合”产生的经济和社会背景，说明其历史的必然性。其次，实行生产、生育、生活“三结合”将计划生育、人口控制纳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轨道，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体现了党的基本路线。再次，分析了“三结合”是计划生育由行政管理机制向利益导向调控机制转变的有效形式，使计划生育管理逐步走向科学化、规范化，同深入改革和扩大开放相适应。本章最后就“三结合”与社区综合发展的关系展开论述说明，积极推广“三结合”有利于推动人口与社区综合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是加强社区建设和中观人口控制的一条有效途径。

下篇，微观论，为本专著核心部分。重点分析家庭经济与生育的变动，进一步阐发了作者以前提出的孩子社会附加成本——效益理论，并联系到可持续发展，探讨人口控制机制转变基本思路和长期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选择。

提出当今中国人口控制应在保持宏观稳定条件下重点转向微观，对西方微观人口经济学理论作出评价和分析，是第六章“战略性转移：利益选择与微观人口控制的增强”的任务。该章首先分析了中国宏观人口控制的历史使命：人口控制目标、人口控制政策、人口控制办法已达到比较成熟相对稳定时期，应将人口控制的重点转向家庭微观方面。迄今为止，恐怕为首先这样提出和论证这个问题。微观人口学方面已有相当多的研究，对这方面的研究作出科学的分析和评估，是合理借鉴科学成份的前提，主要是对莱宾斯坦（Harvey Leibenstein）、贝克尔（Gary S. Becker）等

的孩子成本——效益学说作出比较全面的评价。结合中国实际，在对中国 1992 年 10 省市家庭经济与生育抽样调查资料分析基础上，得出家庭收入水平与生育子女数量成负相关关系，即人均收入越高生育子女数量越少；家庭收入水平同支付孩子的直接成本成正相关关系，即随着家庭人均收入的增加用来培养孩子的货币成本随着增加，但时间消耗的间接成本无一定规律；孩子向家庭提供经济收入效益，总的的趋势是家庭人均收入越高提供越少，相反越多；全国孩子主要效益构成，第一为天伦之乐精神效益，第二为养老效益，第三为经济收入效益，余则所占比例较低。这些结论性分析意见，是建立在掌握第一手调查资料基础上得出的，对生育决策选择有一定意义。

第七章，实践的升华：孩子社会附加成本——效益。是作者在吸取西方微观人口经济学理论合理成份，坚持结合中国实际已经提出，这里作了进一步阐发的理论。该章指出西方孩子成本——效益理论在单一市场经济前提、单一家庭调节单位、单一经济决定因素方面的局限性，不适应当今世界人口变动，特别是许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后，使生育率发生明显变动的情况，中国最为典型，需要新的理论。孩子社会附加成本——效益理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和做出论证的。它是由社会外在因素决定，在原家庭孩子成本——效益之外增加或减少的成本——效益。按其性质，又可分为直接孩子社会附加成本——效益，按照一定的生育政策规定，社会通过直接的经济办法增加或减少的孩子成本——效益；间接孩子社会附加成本——效益，指社会通过非经济办法，如行政、舆论等手段增加或减少家庭的孩子成本——效益。该章在定义了孩子社会附加成本——效益后，提出和论证了具体的计量方法，将定性与定量研究结合起来，并通过具体案例演算，说明在影响生育率变动中的作用。这一理论的提出和论证，将决定孩子成本——效益的因素由家庭推演到社会，提出了操作的计量方法；将国家的人口政策与家庭生育行为结合起来，发展了原

本意义上的孩子成本——效益理论，也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口控制提供可供选择的政策思路。联系中国实际，人口控制机制由以行政手段为主向以行政手段与利益调节相结合，并逐步过渡到以利益调节为主的改革，提出适当增大独生子女、计划内生育子女的社会附加效益，增加计划外生育子女的社会附加成本，削减同等条件下计划外生育子女效益，实行分配上适当向脑力劳动倾斜等政策具体办法。近年来计划生育“三结合”的出现，充分体现了利益导向原则，是孩子社会附加成本——效益具体的成功运用，拓宽了政策的思路。

续篇，发展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口控制不仅要着重解决当前的现实问题，而且要从长远发展战略考虑，寻求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笔者在广泛查阅近年来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并紧密结合中国实际，提出市场经济条件下 5 个方面的可持续发展：

人口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基本点是：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调节人口结构，实行以人口数量控制为主，控制、提高、调节相结合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控制、提高、调节”三者是辩证统一，控制有利于提高，也有利于人口年龄、城乡、地区结构的调节。但提高和调节也不是消极的，人口素质的提高有利于数量控制和不合理的城乡、地区分布结构的调节；人口城市化和东西分布不合理的改变，也有利于素质的提高和数量的控制。因此，全面解决中国人口问题不仅是数量控制一个方面的问题，计划生育部门一家的事情，而是关系到卫生、教育、生产、生活等诸多方面，涉及许多部门的事情，需要统筹安排，协同解决。

人口与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这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条件，因为抛开具体国家和地区而言，经济发展不外是资源的物质变换，归根结蒂取决于资源的存量、开发和利用。文中对“资源(Resource)”的中、英文概念作了考察，给出定义，作出分类划分后，着重指出资源的稀缺性。中国不仅资源人均占有量低，存在一般意义绝对数量上的短缺，而且存在 3 种形式的结构性短缺；总

体资源中需求量较小的某些金属、非金属矿藏比较丰富，某些最重要资源短缺；同类可替代性资源中，劣质资源比较丰富，优质资源比较短缺；开发条件的结构性短缺，某些开采成本高、难以利用的资源比较丰富，某些开采成本低、容易利用的资源比较短缺。面对人口还将继续增长，人均消耗资源不断上升的“分母的加权效应”，人口多与资源不足的矛盾将变得突出。我们理应为尽早实现小康和走向富裕而努力奋斗，但是不要忘记，生活提高的背后是人均资源消耗的提高，人口增长与资源稀缺矛盾的加剧，需要重新审视我们的消费模式，走出一条与“分母加权效应”相适应的适度消费可持续发展道路。

人口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对世界，重点是中国的环境状况作了比较全面的阐述，指出人口与环境问题的严重性。结合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认为除贯彻以往行之有效的保护环境办法外，借用“科斯（Coase）定理”应将环保放在追求社会产值最大化上。办法可以考虑污染外在环境效应内在化办法，即在准许排污限度内采取市场化手段，出让污染产权：可以由生产污染市场主体买入排污产权，也可以由可能承受污染市场主体买入不准他方排污产权，买卖双方实行市场竞争原则。这样既可保证排污不会超标，又可保证正常建设的顺利进行，是一项值得试验的改革。

人口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是全部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它包括总体人口与生活资料的可持续发展。文中强调两点：一是不能简单的以人口与经济增长率对比，保持原有生活水平不致下降的经济增长率应是人口增长率与投资系数的乘积。二是鉴于中国人口数量庞大，主要生活资料供给必须建立在自力更生基础上，粮食更是如此；生产年龄人口与生产资料的可持续发展。在注意生产年龄人口激增解决好就业问题同时，主要实行就业重点转移，还要注意发挥社会抚养比下降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的优势，加快建设步伐；人口质量与技术进步的可持续发展，特别提出分配上要实现复杂劳动是简单劳动倍加的原则，刺

激家庭进行人口智力投资的积极性；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障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指出中国人口老龄化提前到来与经济发展滞后的“时间差”，养老保障必须在大力发展社会供养的同时，继续提倡家庭供养和老年人口再就业自养，并进行老年离退休制度的改革；人口城市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可持续发展。人口城市化作为共同发展的趋势同样在中国发生和发展着，问题出在中国城市人口规模的不确定性，几经变动，无一定的规范。可持续发展目标，是寻求乡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与三次产业结构合理化相适应，即实行主要面向第三产业的发展战略。

人口地区分布与生产力布局的可持续发展。中国以瑷泽——腾冲一线划分的人口地理分布，即该线西北国土面积占 52%，人口仅占 5%；该线东南国土面积占 48%，人口却占到 95%。而东南沿海 12 个滨海省、市、区面积占全国 14%，人口却占 41%。这一格局的形成有自然的、历史的原因，也有人口构成方面的原因。实现可持续发展，要正确估价西部、中部、东部的优势所在，依据具体情况，在劳动密集、技术密集、资金密集型产业中做出合理选择。

人口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笔者突破以往在这方面论述的框架，将社会调控系统分成调控主体、调控媒介、调控客体 3 个子系统，相应的将人口分成领导层人口、执行层人口、承受层人口 3 个基本层次，以及 3 个基本层次交叉形成的 4 个层次，共计 7 个人口层次。按照这样的社会与人口的层次划分，探讨人口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思路，主要阐发：

领导层人口与社会调控主体系统的可持续发展。重点是解决好执政党的建设，提高领导者的政治素质和思想素质，增强拒腐倡廉的能力；提高领导者的科学、文化、管理水平，使之成为内行，提高决策能力和效率。

执行层人口与社会调控媒介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一是要解决机制臃肿问题，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实现真正的政企分开；通

过政治体制改革，设置精简、效能、统一的机构。二是要提高执行层人口素质，特别是思想素质和文化素质，提高办事效率。

承受层人口、结合层人口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部分情况比较复杂，涉及到现存人口与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从可持续发展角度观察，主要是：消除贫困与适度经济增长，重点是通过发展落后地区经济，解决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差距拉大问题；满足就业和生活资料的基本需求，指出这一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稳定的基本问题；兼顾效率与公平原则，坚持“效率第一”，在提高效率下兼顾公平；推动技术进步与危险的有效控制，坚持以技术进步推动可持续发展，但要注意技术进步可能带来的新的危险。人口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同科学技术进步结合起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目 录

前言 (1)

上篇 宏观论

第一章 革命性突破：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 (3)

第一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 (3)

第二节 改革率先从农村开始 (14)

第三节 城市改革的市场取向 (29)

第四节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人口因素 (35)

第二章 历史性转变：人口再生产回顾与展望 (44)

第一节 中国人口数量变动的历史回顾 (44)

第二节 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 (59)

第三节 目前的人口状况 (79)

第四节 未来人口发展趋势 (107)

第三章 跨世纪工程：市场经济对人口控制的制约

与影响 (122)

第一节 人口控制与市场经济关系概论 (122)

第二节 市场经济对人口控制的积极作用 (127)

第三节 改革过程中的不利影响因素分析 (136)

中篇 中观论

第四章 对接的链条：中观人口控制与社区发展 (147)

第一节 社区的理论与实践 (147)

第二节 中观人口控制的对接作用 (167)

第三节	市场经济中的社区	(178)
第五章	“三结合”道路：中观人口控制的创举	(186)
第一节	探索“三结合”道路	(187)
第二节	纳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轨道	(195)
第三节	实现向利益调节机制的转变	(202)
第四节	寻求可持续发展目标	(208)

下篇 微观论

第六章	战略性转移：利益选择与微观人口控制	(215)
第一节	宏观人口控制的历史使命	(215)
第二节	西方孩子成本——效益理论	(228)
第三节	家庭经济与孩子成本——效益	(236)
第四节	人口控制重点的转移	(243)
第七章	实践的升华：孩子社会附加成本——效益	(257)
第一节	孩子社会附加成本——效益的提出	(257)
第二节	孩子社会附加成本——效益理论	(262)
第三节	孩子社会附加成本——效益理论意义	(268)
第四节	市场经济条件下孩子社会附加成本 ——效益的调节	(272)

续篇 发展论

第八章	可持续发展：人口控制长期战略目标的选择	(279)
第一节	人口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279)
第二节	人口与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285)
第三节	人口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295)
第四节	人口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03)
第五节	人口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317)
后记		(331)

上 篇

宏 观 论

第一章 革命性突破：改革开放 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

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通过一项决议，宣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成立70多年来第一次将“市场经济”写入自己的行动纲领，是一次历史性的革命突破。它是中国43年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验的总结，尤其是近14年来实行改革开放经验的总结，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发展的总结。这一突破不仅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而且对政治、文化以及整个社会生活都将产生深刻影响。人口问题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其生产关系性质在人口生产上的体现，说到底是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问题，人口控制受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制约正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因此，本书《市场经济与人口控制——从宏观到微观的分析》以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为首篇，实为后面各章讨论人口增长的社会前提。

第一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改革目标

一、历史的选择

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总结和比较国内外无数次正反两方面经验的选择，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摸石头过河”实践的选择，是历史的抉择。

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曾经有过数千年的辉

煌，对人类的发展做出过杰出的贡献。工业革命发生后，先是英国，接着是法国、德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相继走上工业化道路，墨守陈规的中国才变得落伍了。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北欧加速发展起来，亚洲“四小龙”也迅速崛起，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致力于“后工业化”，到70年代后期我们惊奇地发现：落伍的差距并未缩小，在某些方面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照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睡狮”醒来理应与群雄一争高低，为何却仍旧裹足不前？对此确实应当进行反思，从沉睡落伍之日起的认真的反思。

中国在明末已经产生资本主义萌芽，如果没有帝国主义的侵略，也会一步步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但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改变了历史航船的方向。为了说明问题的实质，不妨将这一时期以来的中国与日本的情况，所发生的重大事件的不同后果作一个比较。

首先，两国都程度不同地遭受到资本主义发展较早的英、法、荷、美等国的侵略和骚扰，有过由抵抗到被迫开放的经历。中国满清政府向来以中央帝国自居，不把洋人放在眼里；鸦片战争失败则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清政府当权者卖国求荣，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被迫打开闭关锁国的大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早在19世纪初便试探着敲开日本的通商口岸，幕府以“祖宗之法不可变”为由严加拒绝。1854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柏利准将率10艘军舰直抵神奈川河口，迫使幕府签订《日美和好条约》，结束了200多年闭关自守的局面。1858年再签订《日美友好通商条约》，丧失关税自主权利，并同荷、俄、英、法等国也签订了类似的条约。

其次，这一期间两国都发生了旨在推翻封建王朝统治的武装斗争。中国于1851—1864年经历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给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以致命的打击。孙中山（1866—1925）领

导民主革命 40 年，终于在 1911 年推翻满清封建王朝统治。日本 1866 年爆发全国性的市民暴动，农民暴动更是此起彼伏，斗争矛头直指封建幕府统治。与此同时，无论中国还是日本，统治者内部的明争暗斗也趋激烈。1867 年执掌日本政权 265 年的德川幕府宣告结束，开始了明治天皇时代。

再次，两国都曾经进行过意在削弱封建势力、发展资本主义的改革。中国的洪秀全（1914—1864）被誉为最早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代表人物之一，提出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男女平等，发展对外贸易等主张。其后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严复（1853—1921）等更提出系统的改革主张，曾七次上书满清皇帝，终于在 1898 年被光绪皇帝采纳，推行“戊戌变法”。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提出建立近代货币信用制度，发展铁路、邮政、机器制造，开发矿山等 6 项“富国”主张；“劝工”、“惠商”、“务农”、“恤穷” 4 项“养民”主张。尤应指出的是，明确提出“以商立国”，在变法期间又提出“定为工国，而讲求物质”的口号，率先倡导资本主义工业化；反对封建官僚垄断式工业，除货币、邮政外都应“一付与民”，“纵民为之”，发展私人投资自由资本主义。“戊戌变法”自 1898 年 6 月 11 日始至 9 月 21 日终，共经历 100 天的时间，故又称为“百日维新”。日本的维新要比中国早 30 年，1868 年明治天皇公布“五条誓文”，接着又公布“政体书”，成为明治维新的纲领性文件。核心是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政治上主张“广兴会议”，经济上振兴工商业，外交上发展与外国通商往来，文化上吸取西方科学知识，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收到了实效，成为日本由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转折点和关键。

我们用一点儿篇幅比较 19 世纪中、后期中日两国社会情况，在于说明经济、政治、文化上具有颇为相近之处，站在历史发展的同一水平线上。最大的不同，是日本的明治维新取得成功，迅速加入资本主义列强行列；中国的“戊戌变法”遭到失败，一步